

在熔炉中成长

■贺捷生

鱼得水,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像滚雪球那样发展壮大,就在于聚集在我父亲这面大旗下的,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他们投身革命,既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只为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黑暗统治。少年贺炳炎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了革命道路。

给地主放过牛,当脚夫挑过炭,还未成年便流落他乡以打铁度日的贺炳炎,1929年在路过湖北松滋的红军队伍中,惊喜地看到了他失散多年的父亲,立刻扔下铁锤,跟了上去。他父亲贺学文嫌他年纪小,用扁担撵他离开,他誓死不从,哭喊着对父亲说,我不是跟你走,我是跟贺龙走。我父亲批准他参加红军后才知,他原来的名字并不叫贺炳炎,而是叫“向明言”。他以冲天大火熊熊燃烧之意改名换姓,就是要浴火重生,改写自己的命运。我父亲一下喜欢上这个倔强的孩子,放他在自己身边,先派他去喂马,再派他去提小糍糊桶副标语,然后再派他穿越火线去给部队传令。从此,他就像一块生铁被送进了熔炉,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让自己熊熊燃烧。五六年过去,他从我父亲的警卫班长起步,火速提升,到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刘家坪挥兵长征时,已是带领几千人当先锋打头阵的红五师师长,成了我父亲的左膀右臂。在无数个险仗、恶仗中,他冲锋陷阵,气吞山河,打了一个又一个硬仗。在长征中攻打贵州瓦屋塘东山高地的战斗时,他

的右臂被达姆弹齐肩打断了。在不截肢将危及生命、他又死活不让截的情况下,方面军卫生部长贺彪只得请我父亲作决断。我父亲当即拍马赶过去,命令他服从医生的意见。有我父亲一句话,他也二话不说,不打麻药就让医生把右臂截去了。就这样,战斗到1949年,贺炳炎带出的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列为一野第一兵团第一军。他自己后来也晋升为大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

通过2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历练,我父亲站在时间的两端,和贺炳炎共同把一个军长与士兵的故事,演变成了一个元帅和上将的故事。同时,贺炳炎也为我父亲和红二方面军赢得了无上荣耀。按现在的人看来,这个旧时淳朴憨厚且蛮劲十足的农民,曾经的放牛娃和打铁匠,就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许多将领一样,没什么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仅仅因为上了多少年学,读了多少书,能做多么高深的学问,就算有文化吗?我认为,用这个标准来讨论我父亲贺龙和贺炳炎这一代将帅是否有文化,至少是一种误解、一种偏见,既不公平也不公道。谁都知道战争是流血的,是一种需要把人的智能、体能和生命中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残酷较量,隐藏在战争内部的规律博大精深,有形而又无形;像我父亲这样的元帅和像贺炳炎这样的将军,他们所经历的战争,除去涉及到高超的计

回家的路

■胡丹丹

苹果树长势喜人。

进入21世纪,我的父亲曾应邀回陕北老区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主题活动,循着父辈足迹,他一步步丈量着回家的路。还是从武汉出发,沿着高铁新干线去郑州转西安回延安,再沿着平坦的国道驱车前行,很快就能看见后山硕果累累的苹果园,就能听到故乡云端悠扬的信天游呼唤着归来的亲人。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的沧桑巨变,使得百曲千折的回家路渐成坦途。高铁飞云掣电,如银龙穿梭在日新月异的革命老区和红色记忆里。当陕北老家的乡亲们得知新建的西安北站和延安站都是由远在湖北武汉的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的,还特地嘱咐我父亲一定要好好谢谢那些做设计的后生们。中国“智造”的高铁,是新中国成立70余年壮丽画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让神州大地上的运输网络连接东西、纵贯南北,让国人“坐地日行八万里”梦想成真。

20世纪90年代,我也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赴延安开展党务干部教育培训班,在教育学习中共同唱响心中的“延安颂”。同样,我们也是从武汉出发,全程

高铁飞驰电掣经郑州东过西安北抵达延安,7个多小时的飞奔令人心潮激荡。高铁“贴地飞行”将回家的路一寸寸开启,带我一步步走近故乡。辽远的前方不见孤烟,不见落日,只有红色故里的灯火燃灼我的向往。

这是一次直抵灵魂的党性洗礼,在宝塔山上,我们重温入党誓词并郑重宣誓,牢记初心与使命;驻足“为人民服务”讲话处,我们诵读红色诗篇,将党的宗旨镌刻于心;走进杨家岭、王家坪和枣园,我们在土窑洞前聆听红色传奇、感受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一字一句,领会延安精神;一书一课,追忆红色岁月。

尽管我没能探访祖上老家,却在红色故里瞻仰了革命先辈彪炳千秋的辉煌。我看见,为了宏伟的志向,他们用青春,甚至用生命演绎华夏最壮美的篇章。我看见,他们也曾丈量过一程又一程回家的路,但却几过家门而不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打下天,一路播撒红色火种,照耀中国革命胜利征程。

尽管我那负过伤、立过功的红军爷爷早已离去,我却革命圣地听闻中国

奶汁草

■王雪岩

厨房的垃圾桶是个破车筐,盛菜的铁盘子掉漆了;最糟糕的是客厅里的冰箱,“嗡嗡嗡”的噪音有点大。我们多次商量要集资给奶奶换个新的,奶奶总是摆手说,一点儿也不吵,战争年代比这吵多了。奶奶笑呵呵地说,能活到今天,她已经很知足。

奶奶怕冷。有一次,我们夸她识文断字,是个文化人,奶奶很受用地笑着:我们给她印歌词本,全是奶奶爱唱的歌,《为了谁》《红军不怕远征难》《社会主义好》……她认真地翻看着,一直笑到最后;我们给她送电子体重秤,她立马戴上老花镜,左看右看,怯生生地问:“这是个什么东西?”当我们挽着她站上去时,她小心翼翼地踩坏了。数字显示奶奶的体重是112斤,她既好奇又兴奋,连着上去下来好几次,和淘气的小朋友差不多。

奶奶怕热。夏天也穿毛衣毛裤,刚入秋,奶奶就穿上了棉裤。奶奶爱唱歌,最爱唱《为了谁》。我们每次去,都给奶奶唱这首歌。学生们也会给奶奶

表演各种节目,舞蹈、相声、小品、朗诵、课本剧……我们常和奶奶促膝谈心,她的家几乎变成了聊天室;我们一起唱歌,她的家就变成了演出现场。

奶奶心很细,我教她唱歌时,她搂着我的肩膀,边唱边搭嘴,我问她这是干什么呀?她说有“口气”怕熏到我不礼貌。有次去她家,奶奶从茶几底下拿出半瓶矿泉水说:“丫头,这是你上次喝剩下的,没舍得扔,一擦茶几就想起你来了。”感动得我掉了眼泪。

奶奶给我们的创刊起名《小草》,她关注学生们读书,鼓励学生们学好语文,还把《小草》送给老家的亲戚和战友的孩子们。每次去,我们都把介绍奶奶的书报拿给她,可每一次她都“委屈”地说,都让来家的领导和战友的孩子们拿走了,我们只得再给她一份。

记得有一次我和奶奶比个儿,奶奶1.74米,我才1.58米。我说完喽,坐火箭也撵不上奶奶了!奶奶高兴得像个孩子般笑了起来。

去年初夏的一天,我们端着盆,拿

名家近作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参军到边防某雷达团,后又到雷达站工作了一年。我工作的雷达站地处北部边陲,听老兵说,雷达站离边境线只有几十华里,记得从团部到雷达站时,老兵开了两天的车,起早贪黑的,才把我和满车的供给送到雷达站。

我们这个雷达站肩负着战备任务,有五六十号人,算是一个大站了。因地处偏远,周围几十里杳无人烟,平时我们休息时也没什么好去处。不知是哪个老兵在离雷达站十几里路的地方发现了一条山沟,说是山其实就是草原上的土坡形成的褶皱。每年的七八月份这里都开满了黄花,金灿灿的一地,扯地连天的样子。这些黄花簇拥着,在不经意的风中摇摆着,发出阵阵袭人的香气。从那时开始,每到七八月份这条黄花沟便成了我们唯一的去处。从雷达站出来向东走上一个多小时,便是那条令人神往的黄花沟了。后来有人说,这些黄花可以做成黄花菜,城里的饭店一份加些肉片的黄花菜价格不菲。有好事者采了一些回来,交给炊事员去料理,不知是炊事员水平差,还是大锅菜不好炒,做出来的黄花菜味道的确不怎么样。但这时已有老兵探亲把黄花菜带回家里,品尝过,据说和饭店的味道并无二致。

也就是从那以后,有假期的老兵再去黄花沟时,便多了项采摘黄花菜的任务,士兵们相互帮忙,很快便摘了可观的一片。采好的花并不马上带走,而是摊在草地上,待一周后这些花干了,才小心地收起来,仔细地留存起来。下第一场雪之后,便有老兵陆续回家休假,带着那些已经干掉的黄花,不久之后,老兵们又会带着黄花菜的故事回来。然后我们望着漫天的飞雪,等待着来年的春暖花开,还有那个关于黄花的美丽传说。

看黄花、采黄花一年有一个季节,更多的时候,我们最好的陪伴是连队订的两份报纸,一份《人民日报》,还有一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全连只有一份,放在连部办公室里,用书报夹装订起来。《解放军报》订到班,我们宿舍就有一份。因为我们雷达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些报纸和我们的信件都是团部运送养车捎来的,大约一月来一次。我们看到的报纸,也大抵是一个月前了。读报纸时,明知是一个月前,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新闻,报纸上的人和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我们班七八个人,一份《解放军报》不知在我们手里要传递多少回,也不知看了多少遍,原本坚挺的纸张已经变皱发黄,再也发不出纸的声音了,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这份报纸仍然是我们最好的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读着报纸上那些文章,感觉我们这里冷清孤寂,仿佛是被世界遗忘的一个角落。我们经常站在某处望着远方发呆,有时也讨论着《解放军报》所反映的



巍巍太行(中国画)

潘文良作



长征

第4902期

遍地花香

石钟山

热火朝天的军营生活。

直到一个月后,又有送给养的车来,我们已有了新的报纸,清脆的纸张声音在我们宿舍里传阅,就像一首美妙动听的音乐。有报纸相伴的日子,兵们的梦都是繁华的。记得有个新兵姓黄,正在学习新闻写作,所有的旧报纸都被他收集了,厚厚的一叠放在床下,珍宝一样地呵护着。有一天,一个老兵吸自卷的烟,卷烟纸没了,便顺手撕下报纸的一角卷烟吸了,被黄新兵发现了,两人吵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黄新兵发那么大的火,脸红脖子粗的,差点哭出来,后来又跑到连部告了老兵一状。在晚点名时,指导员站在队列前又重申了一次报纸的重要性,还不点名地批评了那个不爱惜报纸的老兵。弄得老兵很没面子,磨叨了好一阵子。

黄新兵果然在写作上有了起色,他写了许多关于雷达站的新闻和生活趣事,陆续发表在兵报上。他后来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兵,再后来又考上军校,毕业后也成了名新闻干事,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又经历了许多大小单位,从基层到机关,每天总会有《解放军报》相伴,报纸都是当天出版的,散发着油墨气息,但我总想起在雷达站的那些日夜。一份报纸在兵们手里传来传去的情景,还有那个姓黄的新兵,在夜半时分,把一张报纸放到被窝里,打着手电研究学习的情形。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再想读《解放军报》时,打开手机,点开《解放军报》客户端,报纸上的内容随时随地都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不知为什么,我还会想起若干年前的雷达站,孤独的时候站在某处,眺望望着远方,想象着报纸反映出的火热军营,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黄花,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便伴随左右了。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我参加过贺炳炎上将的一个纪念追思会,会上频频说到贺炳炎与我父亲贺龙在战争年代建立的那种非常特殊的将帅关系,即我父亲始终器重他,厚爱他,每到险仗、恶仗,都把他用在刀刃上。其实,一个统帅的纵横捭阖,正是得益于爱将的出生入死。

大家都知道,我父亲贺龙曾经是旧军人,1916年他带领12个弟兄砍了芭茅溪盐局后,参加革命,投身北伐战争,官至国民革命军中将军长。但是,当他作为总指挥发动南昌起义,在带领部队南下潮汕途中,却被打得七零八落,成了出身于割削阶级。当革命需要他们走出革命面、戮力前行的时候,都迷失了方向。1928年1月,周恩来同意我父亲回湘西重整旗鼓,再拉一支队伍。他赤手空拳,从上海溯流而上,经洪湖返桑植,在当年春节前夕发起的年关暴动中,前呼后拥,一时应者如云。这之后,他只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带出了浩浩荡荡,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而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如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歌中所唱的绥德就在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那里曾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终点,是延安的天然屏障,也是抗日军政大学等红色育苗基地。中国人民革命领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那黄土高原山梁沟壑里,不仅被汉唐雄风、红色风暴烈烈袭过,更有“拦羊嗓子回牛声”唱响信天游,也有我的根脉、我祖上的老家。我的爷爷就是高大英武的“绥德汉”,他14岁就离开家参加红军,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一去就是几十年未回家。

20世纪60年代,爷爷少小离家后第一次回乡探亲。从武汉出发乘几天长夜绿皮火车,又辗转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再跋涉数公里崎岖的土路,才望见长相守望的窑洞灯光。那回家的路阡陌纵横,辛苦漫长。

20世纪90年代,爷爷离休卸下戎装再回绥德,那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回家。又是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尽管沿途有人接送,仍难免舟车劳顿、辗转多时。记得爷爷回武汉后洗却风尘,便忙不迭给老领导通电话,细数家乡变化和老区新貌。他特别提到改革开放后,自家兄弟承包了老家荒芜的后山,那满山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收到赵晓红的微信时,我正在“塔子山战斗遗址”的松林里挖婆婆丁,赵晓红的一句“李佩芝奶奶走了”不啻晴天霹雳,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等稍微缓过神来,想赶去送奶奶一程时,赵晓红却说,奶奶身边全是医护人员,连她都不能近前,让我还是别去了。听了赵晓红的话,我忍不住泪如雨下……

李奶奶是河北威县六区贺刘镇人。年轻时,她眼力好,枪法准,作战勇敢。和李奶奶相识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那天,当我把师生代表领到李奶奶家,就此拉开了我们长达十多年的深情厚谊。

每次去,奶奶都给我们讲战争故事,每次都有新内容,老师们听得如痴如醉,学生们则围在奶奶身边不愿离开。奶奶拿出军功章和许多黑白照片给我们看,还脱下军装让我们试穿,帮我们系扣子。一张张军装照,把那些没去过奶奶家的师生们羡慕得不得了。

奶奶生活很简朴,脚上穿的拖鞋,密密麻麻用线缝着;奶奶的牙刷是战争年代的铁缸子,漆着“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还有奶奶家的窗帘、沙发套、电视机罩都旧了,家具也是老式的大柜子;